教授治学

识字正史 发微烛幽

——专访中国语言文学系曾宪通教授

■ 本报记者 蔡佳茵



①1976年曾宪通、黄光武(右)与容庚先生(中)在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



②1974年曾宪通(前右一)与商承祚先生(右二)在北京与秦汉简帛整理小组成员合影



③2011年摄于潮州菟园之“天啸楼”

曾宪通：1935年生于广东潮安，195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留校从容庚、商承祚两位先生治古文字之学，主攻战国秦汉文字。1985年起任教授，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和人文学院院长，曾担任国家社科规划语言学科组成员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长，现任国际潮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合著)、《曾宪通学术文集》、《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丛考》及教材《汉字源流》(合著)等。

夏日午后，我们应约来到曾宅门前，不免心怀谒见长辈的忐忑。然而，当门后传来曾宪通教授带着乡音的爽朗话语，见着他将我们迎进屋时和蔼的笑颜，一切的拘谨便都释然了。“我的故事其实很平凡”，这是曾老在第一封邮件里对我说的话。他像我们自幼熟见的潮汕长者一样，亲切而健谈。在袅袅的功夫茶香中，曾老将他的故事娓娓道来。

缘结古文字：康乐园里的中秋明月夜

听故事的人总是有追根溯源的情结，希望重回“很久很久以前”的时空彼端，我们也不例外。曾教授回忆道，他与古文字学大半辈子的缘分，始于1955年皓月悬空的中秋夜。那年秋天，他从汕头金山中学毕业，考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当时的许多同学一样，对古文字谈不上有多少了解。不曾想，康乐园里的第一个中秋节，竟能与容庚先生及夫人一同赏月，年轻的学子们自是欢欣雀跃。在东大球场的绿草坪上，月华如水，笑语如歌。趁此良辰，同学们遂争相向这位蜚声海内外的古文字学家请教“古文字为何物”。容先生风趣地解释道：**“所谓古文字，就是我们的老祖宗用过而你们今天还不认得的字。”**然而他勉励大家，“要学会古文字也并不难，我当初学钟鼎文时还不是个中学生?”从容先生的谈话中，这群青年学子看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人生轨迹：默默无闻的中学生通过潜心研究古文字，最终成为了鼎鼎大名的大学教授——他如何在舅父邓尔雅的影响下学习《说文解字》，与弟妹们分工搜集古文字资料编书，又是如何夹着《金文编》稿本谒见考古学家罗振玉，成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毕业后担任燕京大学教授，等等。

那年中秋以后，在系里多位语言文字学家的影响下，曾宪通开始对历史悠久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分别设有语言学和文学两个专门化方向，他主动修习了语言文字学系列的全部课程。曾教授说：“那时候，政治运动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反复无常，没有一定标准可言。同一部作品，一会被当成‘香花’，一会被当成‘毒草’，令人无所适从。而**古文字学却别有天地，一个字有几种考释，总有一定标准，而论证的过程就是科学的探讨。**”古文字学的入门虽说不易，一般人望而生畏，但用心钻研，按照老师的指点，总归能有所依循，从而做出成绩来的。从那时起，他便有心朝着这个方向前行，好好探索古文字学这块宽广无垠的天地。

沉潜岁月：培植治学根基

月色中的独行者

乘着月色，朝着月亮升起的方向，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

曾教授这一代人的治学生涯都是从动荡中走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应接不暇，常常打乱求学的步调。他坦言十分羡慕如今的年轻人，有安稳的书桌，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中能够做到守一不移，不忘初心，究竟需要怎样的精神力量?对于这个问题，曾教授并没有用三言两语来打发。

1960年初冬，中大中文系师生根据广东省委的部署，在校党委陈彬副书记的率领下，到揭阳参加整风整社和劳动锻炼。有一天下午四点多钟，师生们接到了元旦放假两天的通知。曾宪通得到了所在大队部领导吴宏聪教授的批准，回家看看年迈的父母亲。那时天色已晚，搭车是不可能的了，25岁的曾宪通自信地决定徒步回家。多年后，在文章中，曾教授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53年前自己的这一次孤身夜行——“我壮着胆子，乘着月色，朝着月亮升起的方向，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这时候，除了远处几点忽隐忽现的灯火和断断续续的狗吠声外，只有脚下不断延伸的山路。”

月夜徒步的艰辛换来了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特别是父亲在来年便溘然长逝，那一次短暂的相聚更显得异常珍贵。然而一天后他匆匆离家赶回大队部报到，却比规定的归队时间晚了两小时。令他意外的是，在向吴宏聪教授报告回家之行并作检讨时，吴教授并没有提出批评，反而用略带鼓励和欣赏的语气说，**“你用十多小时，走了一条没有走过的山路。宪通，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你。”**在那个动辄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的“运动”时期，这样的理解和关爱是如此难能可贵。从此，月色中孤身夜行，探索未知之路的勇气与坚毅，便深深地烙印在曾宪通的心底。

钻“冷门”的青年人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礼记·中庸》

1959年7月，曾宪通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正式毕业，由组织分配留校担任容庚先生的助教，兼任古文字研究室的秘书，协助室主任商承祚先生开展日常工作。当他向容庚先生报告自己将担任助教时，竟意外地被 “大泼冷水”——“现在提倡‘厚今薄古’，批判‘厚古薄今’，青年人何苦来钻这个冷门?”原来，“泼冷水”是容庚先生试炼学生的门槛。被泼了冷水却并未动摇的曾宪通，获赠了《金石书目录》，还得以进入那著名的“五千卷金石室”自由阅读。容先生叮嘱他将藏书记号移录到自己的书上，以便按图索骥，并布置他临摹《说文解字》、《金文编》和《甲骨文编》三部字书，细心比较彼此异同，留意某些器物上的特殊写法。容先生对他说：**“大匠予人以规矩而不能予人以巧，巧，只能在刻苦的磨炼中得来。”**容先生亦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每天黎明即起，伏案写作数小时，天天如是。他为自己立下的信条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礼记·中庸》)这句话也成了曾教授至今克服困难的座右铭。

曾宪通跨进古文字学门槛的头一个十年中，有许多日子是在容庚、商承祚二位老先生身边度过的。二位前辈培养学生既没有固定课程，也不考试，但在抄字书的过程中，曾宪通练出了辨别字形的扎实基本功。“现在的资料多了，学生也不用去看实物，直接在网上就有很多资料可供选择，可以做到快、准、多。但这是‘拿来主义’，不容易在脑子里生根。**以前我们抄过那三本字典之后，那些字形好像是从脑袋里自然而然生出来的。如果现在的学者能做到既有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先进的研究手段，在学术上的造诣肯定会超越前人的。**”二老长期从事古文字资料的搜罗和撰集工作，他们擅长字形分析和注重实证的研究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曾教授。如今，他依旧常常对学生们强调，“研习古文字一定要从形体入手，系统地掌握和辨析字形是至关重要的。”

博采众长：明确治学方向

曾宪通研习古文字学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974年初夏。当时正是新中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继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书出土之后，又发现了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这些都是轰动中外学术界的重大考古收获。在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主持下，一大批著名学者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北京的沙滩红楼，组成了秦汉简帛整理小组，在特殊环境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起初，曾宪通是作为商承祚先生的随行人员加入这一行列的，本不是这个小组的正式成员。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翻阅罗福颐先生初步整理的简本《孙子兵法》时，发现一篇名为《形》的简文中，不少句子总是反反复复地出现。对于这一现象，曾宪通大胆提出可能存在两个写本的看法。朱德熙先生非常支持，并嘱咐他试着按照不同字体重新加以整理。这样一来，原本重复出现的简文果然按照不同写本各就各位，证明确系两个写本无疑。与此同时，曾宪通还发现不少与《孙子》十三篇有关的残简，以及《孙子》佚文的残简。因而朱德熙先生建议由他负责继续整理简本《孙子兵法》，并以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与简本相校注。随后曾宪通又参加了简本《尉缭子》校注，《孙膑兵法》简注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整理等。直到1976年夏天北京受到唐山强烈地震的影响，他才离开北京返回广州。

在京两年多的时间，曾宪通不仅接触到一批批十分珍贵的新出土简帛资料，还认识了许多全国一流的老专家，以及众多同辈学者中的佼佼者，可以说正式步入了国内古文字学的学术圈子，学者们所具有的高尚品德和可贵学识使他终身受益。譬如朱德熙先生在古文字研究中既重视字形而又不囿于字形的理论和实践，就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在出土文字资料的释读上，光从字形看问题，往往会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这时，如果能从文字背后隐蔽的语言事实来考察，往往就会出现豁然开朗的新境界。这就是语言学意识的效应。北京红楼两年多的时间也许不算长，但曾宪通却将它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阶段，因为其治学方向和目标，正是在此期间明确下来的。**

相得益彰：古文字研究与古代文化研究相结合

1980年秋天，饶宗颐先生在成都出席第三届古文字学术年会后，即到全国各地进行学术考察。曾宪通作为广东省高教局派出的随行人员，一路陪同。此次考察历时三个多月，行程达数万里。由于饶先生对楚地文物情有独钟，在考察过程中即拟定“楚地出土文献研究”这一课题，邀他共同研讨。1981年10月至1983年12月，曾宪通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副研究员，在饶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共同完成了《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三部著作。在此期间，除了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容向饶先生请教古代术数、乐律和天文历法外，他还领悟到不少治学的门径。就研究地下出土文献而言，饶先生不但主张要释文字、明义理，更强调要从文化史的高度，明因果、溯源流，窥探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饶先生非常重视“三点论”，尤其着力于关联性的层面和“问题点”的研究。**饶先生这种追溯文化渊源的强烈意识和不知疲倦的求索精神一直成为激励曾教授探索中国古代文化的动力。他将这段时间视为自己研习古文字的第三个阶段。**

曾教授说，回头看自己研习古文字学的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次机遇和三度升华，从培植根基、明确方向，到把古文字研究同古代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在长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以古文字学为主体，以战国秦汉文字为重点的研究方向。在方法上，注意从字形入手，联系词的音义，掌握古文字资料的内涵，进而窥探语言、历史、文化等现象与规律，揭示其中底蕴，借微观以窥宏观。回首来路，曾教授谦逊地总结道：“尽管我的研究成果很有限，但我相信自己的路子是走对了的。”

字里千秋：研究成果的回顾

曾教授将自己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所作的工作大体上归纳为如下几点(注)：

一是关于汉字起源的探索。汉字起源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课题，前人已经做了不少探索性的工作，必须用今天的眼光和新的材料重新加以审视和补充。曾教授在《汉字起源的探索》一文中，扼要地概述了文献学、民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各个领域探讨汉字起源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成果，发现这些材料不但可以互相印证，而且可以互为补充，特别是由各个领域所揭示的汉字发生史的进程是大致相同或相近的。它们从多角度、多层次证明了一个事实：**作为中国文明重要标志的汉字是一种自源的文字。**

二是关于古文奇字的考释。其中涉及甲骨文、金文、简帛文、陶玺文和传抄古文等。曾教授的做法是：(1)根据早期文字的构形，追溯其初形与溯义；(2) 按照该形体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用法，探索其音义互动和演变的轨迹；(3)从形的分化、义的引申和音的转移考察文字孳乳、繁衍与同源的关系，为字族的研究提供可靠的线索；(4)联系古籍记载与出土文献挖掘汉字所蕴藏的文化内涵，阐明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汉字体系所具有的更深层文化含义。

三是关于古钟铭和古乐律的研究。共有三组文章：第一组是对宋人著录钟铭的重新诠释，首次指出了宋人误认为商钟的吴王钟；第二组是对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所出残编钟铭文的重新排定和考释，指出它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光编钟而非蔡侯钟；第三组是对曾侯乙编钟铭辞的系统解读。

四是关于战国秦汉简帛的研究。其中涉及湖南长沙子弹库的楚帛书，仰天湖、长台关、望山、包山、郭店等地的楚简，睡虎地的秦简，临沂银雀山的汉简和马王堆的帛书，以及敦煌、居延汉简等。除对简帛相关的字词加以疏释外，还论及楚帛书的神话系统，楚月名和秦汉时制，楚简所见楚国卜筮祭祷制度和文字书法等，对于楚国和秦汉时代竹简帛书的文化内涵，有所揭示和阐发。

五是关于中国古文字学发展史上若干问题的探讨。着重总结某一历史时期的成果和经验，还对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以及容庚、商承祚、饶宗颐等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道路和治学方法，作过比较专门的研究和探讨，以作为后人的借鉴。

结 语

古文字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传统学科：地下文物层出不穷，许多珍贵的古代典籍重见天日。目前，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已不仅只是补充过去已有的知识，有的甚至完全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看法，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形成新的认识。曾教授引用王国维先生所言，“新的发现带来新的学问”，勉励年轻人要坚持不懈地研究新材料，解决新问题，继续发扬老一辈古文字学家的治学精神和优良学风，努力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注：参考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编著《康乐集——曾宪通教授七十寿庆论文集》)

科技前沿

物种是永远不可替代的

——专访生命科学学院何芳良教授

■ 本报记者 杨鹏桦

新闻链接：2013年9月27日，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刊登研究论文《森林碎片化25年后，小型哺乳动物几近灭绝》(Near-Complete Extinction of Native Small Mammal Fauna 25 Years After Forest Fragmentation)，揭示了人工水库建设对物种灭绝速率的影响，是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我校千人计划引进人才、生命科学学院何芳良教授是该文的通讯作者之一。



刊有研究成果的*Science*封面



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地球上的各种生态系统也不得不受其影响，而生态环境破坏与物种灭绝的关系，便日益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也是生物学家们关注的一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一支国际研究小组对泰国秀澜(Chiew Larn)水库进行了长达26年的分段观测和研究。

那么，其研究究竟如何展开？结论是什么？对生态环境保护又有何启示？记者采访了作者之一、生命科学学院的何芳良教授。

26年的水库调查

尽管“生态系统破坏对物种灭绝的影响”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问题，然而，此前因受限于实验场所、缺乏历史本底数据等，学界对该问题仍未有足够具体、准确的科学认识。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此之前，科学界对该问题的了解情况如何？

何芳良教授(以下简称“何”)：以前国际上做环境干扰、生态环境破坏对物种灭绝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只局限在观察鸟类对生境破坏、破碎化的反应。

记：选择泰国秀澜水库进行研究，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

何：首先，人工水库是陆地上理想的“天然实验室”，水库建成后，库区原有的山变成“岛”，在这些人工岛上就可以观测景观破碎化对物种的影响。再加上岛上的哺乳动物大多无法自由迁徙，栖息地面积固定，也方便对比研究。假如连成一片山，动物可以自由迁移，就看不到生境破碎化的影响。其次，该实验所需的数据必须经过长期的实地观测收集而来。26年前，研究小组成员便调查了秀澜水库人工岛上的物种数量，这些数据是计算库区物种灭绝速率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这都是秀澜水库优于其它实验场所的地方。

记：这项研究的开展持续了26年？

何：可以这么说。当然，后期的数据处理主要是依据分段的数据：比如每个岛一开始各有多少物种，到第5年、6年、7年的时候分别剩下多少，再到第25年、26年又剩下多少。这是几个基本点，据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岛屿生物地理学模型，用来计算物种灭绝速率。这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研究，第一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生，他在第25和26年(即2012和2013年)去秀澜水库岛屿做调查，第五作者则是他在新加坡国立的老师；第5、6和7年的数据是第二作者在20多年前调查收集的，他当时正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硕士论文，而第六作者是他当时的老师。我主要负责数据分析和建立模型，其他作者则对文章的写作和修改做出了很多贡献。总之，我们组成了一个很高效的团队。

最快的动物灭绝速率

在长期的实地观测和缜密的数据分析后，其研究结果却令他们大为“吃惊”：岛上一半物种消失的平均时间仅为14年，这是有史以来观察到的最快的灭绝速率。因此，该研究论文的审稿人写下这样的开场评语：“《科学》的读者们，系好安全带，做好被震撼的准备吧！”

记：这一结论说明了什么？

何：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系统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有着致命的影响。另外，我们原以为大岛上的物种会消失得比小岛慢一些，但结果却是更快。这和预期完全相反，也是以前的研究尚未发现的。这说明，原有物种更多的地方，会受到生态破碎化更大的冲击。

记：文章发表后，学界有什么反响？

何：学界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论，因为里头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地方。不过就目前看来，大家都认为这项工作很有价值。我们收到很多同行的邮件，说他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从中得到了一些启发。最近一期的《自然》杂志(11月14号)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专门评论，题目叫“生态赤字”，说明我们的工作引起了大家的思考。

记：国内是否也有相关的研究？

何：中国近几十年修建的水库数量繁多，与秀澜水库状况类似的并不少，譬如新安江水库——千岛湖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建新安江水库，形成了1078个岛。因此有一些老师给我发邮件说，我们也可以在长江三峡水库、新安江水库做类似的研究。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水库众多，但缺乏20年前、30年前以及刚建水库时候的资料——那时候也没有这个意识要去研究这些问题——所以很难做更深入的科学探源。

记：这一问题是否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何：是的。水库建起来，不一定只对物种灭绝有影响，可能对其他东西产生影响。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不光是物种数量的问题，还有其他很多的度量指标，所以也可以考察水库对其他指标的影响。

能源与物种的抉择

该研究除了能给相关研究的开展带来诸多启示，对社会关注的环保问题更是如此，用何教授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于了解、评估和预测生境破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生物多样性的流失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记：这种意义具体表现在哪里？

何：生境破坏会加速物种流失。就国内水库而言，其建设基本上只是作为一个工程问题，不是环境问题。建设时可能也有环境评价，但详细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了解。我想总体来讲，建水库还是必须考虑环境问题——建水库虽然取得水力资源，但是能源可以代替，物种是不可代替的，它们与人类一起组成了地球上无价的生物财富。这甚至是一个伦理问题：人是不是有权力主宰其他生物的命运？

记：您认为目前对该问题的认识还有哪些不足？

何：我们对自然的理解，跟我们的文化、经济都密切相关。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自然保护、生物保护如何平衡，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总体看，中国在这方面意识还非常薄弱。

记：这个研究结论还可以推广到其他领域吗？

何：当然。譬如当你采伐森林，将大片森林砍伐成一小块一小块，使其生态系统破碎化之后，便必然与水库区的人工孤岛一样，会导致物种流失。而这在热带雨林中是个非常严重，而且十分迫切的问题，需要引起全球关注。

做科研首先要有独立性

尽管几年内连续在《自然》、《科学》上发表论文，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当被记者问及自己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工作者时，何老师只是谦虚地一笑：“优不优秀这个很难说。做科研很难评价谁比谁好，这个不像考试，谁分数高就好……”然而，从何教授对自己教学的想法中，却可以窥见其学术观念之一二。

记：您平时是如何要求自己的学生的？

何：我希望他首先要有独立性，这意味着他要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设计一个比较好的实验去验证——这是成为一个优秀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假如什么东西都要等老师给你idea，告诉你怎么设计实验，虽然也能够毕业，但事实上你只属于技术人员，而不是科学家。

记：您是否会鼓励学生提出颠覆性的想法？

何：学生能提出颠覆性的东西当然非常好，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最基本的还是要把自己研究的问题搞透，因为现在科学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几乎所有问题都有人研究，你能够比别人超出一步就很不错了。希望我说的不对，但现在已经不是出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时代了。个人英雄主义已一去不复返了。

记：倘若学生的想法不一定行得通，依然坚持自己的实验呢？

何：我不鼓励也不反对，但你要自己承担风险。当然，老师的判断并不一定就对，但是，那肯定是最好的判断。

(生命科学学院叶畅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感谢！)